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哲学宗教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

A STUDY OF MARXIST THEORY OF RELIGION

— 吕大吉 高师宁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哲学宗教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

A STUDY OF MARXIST THEORY OF RELIGION

吕大吉 高师宁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吕大吉、高师宁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004-9776-9

I. ①马… II. ①吕… ②高… III. ①马克思主义—宗教学
IV. ①A811. 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2920 号

责任编辑 徐申雁 声

责任校对 郭娟

封面设计 孙元明

技术编辑 戴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订 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3.5 插页 2

字数 373 千字

定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目 录

绪 言 以理性的态度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 (1)

第一章 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到 18 世纪法国的启蒙宗教学说

——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历史背景之一 (16)

- 第一节 认识神人关系的实质,把神还原为人,把神性还原
为人性 (19)
- 第二节 通过科学与哲学的理性分析,揭露基督教神学信仰
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实质 (24)
- 第三节 用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考证,把神圣的《圣经》还原为
世俗的作品 (28)
- 第四节 揭露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在社会历史上的消极
作用,打开了从无神论人道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观念的通道 (34)

第二章 19 世纪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发动的宗教批判运动和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宗教观

——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历史背景之二 (41)

- 第一节 黑格尔的宗教哲学 (42)
- 第二节 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运动
——从施特劳斯到布鲁诺·鲍威尔 (47)
- 第三节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宗教哲学 (64)

第三章 马克思、恩格斯参加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运动	
时期的宗教观	(73)
第一节 从传统信仰走向宗教批判	(73)
第二节 参加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运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	(81)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的形成	(97)
第一节 《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	(100)
第二节 作为柏林大学旁听生的恩格斯	(110)
第三节 《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	(113)
第四节 《德法年鉴》时期的恩格斯	(137)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宗教观的完成	(146)
第五章 《共产党宣言》之后的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	(157)
第一节 论著概况	(157)
第二节 论宗教的本质(宗教定义问题)	(161)
第三节 论宗教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社会形态	(181)
第四节 论宗教存在的根源和消亡的条件	(189)
第五节 论宗教的社会功能	(208)
附 西方宗教社会学家论宗教的功能和作用	高师宁 (221)
第六节 关于基督教史的研究	(254)
第七节 从自然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对基督教 神学的批判	(268)
第八节 论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	(279)
第九节 恩格斯晚年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的一些变化	(286)
第六章 列宁的宗教观	(291)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观与列宁的宗教观的 比较分析	(291)
第二节 列宁时代宗教战线的斗争	(296)
第三节 强调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说明 马、恩唯物史观宗教理论的主要方面	(303)

第四节	论哲学唯心主义与宗教的关系.....	(310)
第五节	论宗教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对立.....	(314)
第六节	论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	(317)
第七节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有关宗教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327)
附录	苏联时代的宗教理论、政策、实践与反思.....	张雅平(336)

绪 言

以理性的态度认识和对待 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

本书所要研究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方面，即它的宗教哲学或宗教理论（一般又称为“宗教观”）。这一部分与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比起来，其地位当然要次要得多。不过，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宗教问题的论述，总体上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分来展开的。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代就参加了黑格尔哲学中的激进派——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运动，这是他们一生从事革命性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开始，这个“第一步”对马、恩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没有这个“第一步”，马、恩就不可能从对宗教的批判转向对政治和法的批判，从对天国的批判转向对尘世社会的批判；也不可能在哲学世界观上从青年黑格尔派的崇尚理性启蒙的唯心主义经过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进一步发展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再进一步，如果他们没有通过德国的宗教批判运动创建了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和历史观，并把它们作为研究社会历史和政治、经济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就不可能创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宗教问题、从事宗教批判，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特别是我们的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宗教学者，应该深刻了解马、恩的宗教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在此基础上，对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理论的

意义和必要性给予特殊的重视。

对于宗教问题的批判研究，并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开端，而是贯穿在他们毕生的革命事业之中。只要革命事业提出了宗教问题，他们就会拿起笔来，从事宗教问题的研究和著述。在这方面，恩格斯尤其关注，付出了更多的精力，留下了更多的论著。马、恩的宗教理论，无论是在他们的生前，还是在他们逝世以后，它的影响力也和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一样，是非常之深远和巨大的。自19世纪中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思想学术领域引发了开天辟地式的革命，而且在社会生活中启发了国际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阶级觉悟和革命意志，掀起了风起云涌、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和政治革命。这种影响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欧洲走向全世界，从19世纪延续至今。随着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马、恩的宗教理论也超过了单纯的学术理论范围，成了国际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处理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以及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夺取政权之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宗教理论更成为党和国家处理宗教事务的指导思想和制定宗教对策的理论依据。这样一来，它的遭遇就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几十年来，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对待和处理宗教事务上所走的道路是曲折多变的。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对于我们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认真总结，提高认识。唐太宗李世民说得好：“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① 千古名言，足以为训。我们要看到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它在乘风破浪式的迅猛发展的同时，也遭受到各种社会势力和社会思潮的激烈反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由于它具有的特殊性，其所遭遇的质疑与反对，更彰显出特殊的激烈性。这是因为它在世界宗教思想史上是一种最为彻底的无神论，而在它的对面，矗立着拥有广大信众的传统宗教及其教会组织。宗教和教会有着久远的历史传统，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发生着深刻的社会影响，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它们以神或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上帝的名义，用一切手段，对历史上一切批判和反对宗教的怀疑论、自由思想和无神论思潮，施行残酷无情的打击。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作为一种最彻底的无神论，更是被它们视为洪水猛兽，必欲灭之而后快。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指出：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①

在这个反共神圣同盟中，教皇为代表的宗教势力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们之所以反对共产党，其根本原因当然是因为共产党人要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中也包括消除传统宗教的无神论人道主义理想。正是这个原因，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被维护旧制度的“神圣同盟”当成自己的敌人。这种敌对状况从此一直在历史上延续下来，反对它的声浪长期不断，调门不仅未曾降低，甚至越来越高。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剧变前后，那里的基督教新旧各派教会、东正教会已经明里暗里为反共势力煽风点火，摇旗呐喊。剧变之后，宗教势力更是勃然兴盛起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无神论宗教理论的传统权威地位，俨然被宗教和教会取而代之，甚至被抛进历史的逝波。宗教势力和政治自由派把苏东剧变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失败；当然，也意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宗教理论和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的失败。

在我国，宗教战线的基本状况也有与苏东社会类似的表现。中国共产党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如何对待宗教势力、处理宗教问题上就确立了一个好的政策和传统，这就是主张宗教信仰自由，把爱国宗教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下同，不再注），第250页。

士作为统一战线的对象。这个正确的决策，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减少了革命的阻力，而且在夺取政权之后，也有助于宗教界人士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支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令人遗憾者，这种好景为时不长。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和在1966—197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先后两次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力图把传统宗教作为“四旧”予以扫除。不仅宗教界人士，甚至在宗教战线做实际工作的党政干部，都一下子变成了“牛鬼蛇神”，遭受到不应有的打击。这两次废除宗教的运动，先后都随着“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而失败了。应该承认，这也意味着当时实行的那种宗教政策的失败。

“文革”之后，社会上一部分人由此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本身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怀疑的以至否定的情绪。这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在惨痛失败的历史事实面前，人们易于受激动情绪的支配和驱使，一般人难以冷静地区别何者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核心和基础，何者是后人对它的误解和歪曲；更何况那些推行错误的宗教政策的人，往往把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举得更高，把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喊得更响；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社会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大环境相对宽松，国外的各种宗教和宗教学术思潮大量涌进，各种传统宗教、民间信仰，以至新兴宗教快速恢复和发展，宗教学术领域的理论思潮也逐渐展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文革”之前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世界观对宗教学术研究的一元化指导，受到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冲击。在上述两种情况的影响下，有些人（包括一部分研究宗教问题的学者）便从对“大跃进”和“文革”时期错误的宗教政策的否定，逐渐发展到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本身的怀疑。局部怀疑者有之，全面否定者亦有之；用各种不同方式认为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并无普遍意义者有之，公开宣称它已经过时者亦有之。消极冷对的程度有轻有重，怀疑以至否定的形式“推陈出新”。这种复杂的情况，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在新的历史阶段遭遇到了新的挑战。在这种挑战面前，我们国家宗教战线的实践工作者和从事宗教学术研究的宗教学者不能再像“文革”时期的红卫兵那样，把这些“挑战者”打成“阶级敌人”，以“大批判”的方式对待之。不管各种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持不同意见的挑战者有着什么样的政治内涵，但他们一般都是以不同学术见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我们不能把学术之争归结为

政治斗争。学术上的不同见解本质上是个认识问题，认识上的是非对错只能通过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才能得到合乎理性的解决。认识问题解决了，它所蕴含的政治内涵也就清楚了。

在我国的宗教学术领域，党和国家提倡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宗教观作为指导思想。这种提倡的基本根据就是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既然如此，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宗教理论）作为一种“科学”，它本身应该被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而不是信仰的对象。学术研究的对象应该允许不同意见者的怀疑，也不应担心和害怕别人的反对和否定。一切科学，一切真理，都是在怀疑和否定旧时的成见中成长起来的，它们本身也需要在不同意见者对它们的怀疑以至否定它的挑战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只许别人信仰，不许别人质疑，那不过只是自封神圣的“宗教”，而不是真正的科学。一切主义、理论或学说，只要它是科学的真理，它就应该能够经受得起任何别人的怀疑和反对，是推不翻、打不倒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创建的马克思主义 150 年来不就一直经受各种各样的怀疑和反对吗？苏联、东欧剧变、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惨败，不是曾被敌对者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彻底失败的历史证明吗？这些一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势力，特别是他们的政治家、思想家，不是也趾高气扬地欢庆他们“最终战胜”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吗？然而，历史的真实很快就教训了他们，他们的估计完全错了。马克思和他的思想仍然活在世界上广大人民的心里，影响着他们的精神和行动；这种影响之大、之深，在世界历史上是任何其他的人都无与伦比的。甚至西方世界的主流媒体和知识界也逐渐冷静下来，改变其在“冷战”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全盘否定和冷嘲热讽的态度，重新思考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20 世纪末，即 1999 年秋天，英国广播公司（BBC）用相当长的时间发动一次活动，在国际互联网上通过自由投票，评选一位在第二千纪一千年间全世界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这显然是一件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活动。人们不难想到，一千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第二千纪无疑是社会变革最为激烈，社会进步最为急速，文化、科学、哲学、宗教、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最为深刻的时期。在这一千年间，全世界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叱咤风云、给历史巨轮

以巨大推动的“风流人物”，被人们公认为可以载入史册的“伟大的”、“具有影响力”的历史巨人（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军事家、政治家……），有如天上的繁星，难以数计。要在其中单挑出一个“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No. 1”（“第一号”），那他无疑应该是伟人中的伟人，巨人中的巨人。如其没有创造出开天辟地、震古烁今的历史事功，是绝对不会得到世界公众的公认而入选的。BBC 在经过反复的评选过程之后，最后确定：这一千年中世界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马克思”。排名在马克思之后的人是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这三位伟人都是科学家，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贡献是极其巨大的，特别是他们的科学成就不仅局限于自然科学，还进一步影响到哲学、社会科学、宗教学等很多方面，但是，为什么马克思却以压倒优势居于上述三位伟大科学家之前呢？我们不妨倾听一些投票者的自白。美国人卡普尔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运作模式作出了最好的分析。由于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末实际上已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制度，他的思想学说对于帮助我们认识当今的世界仍极具参考价值。”另一位挪威投票者科里森说：“马克思启蒙了数以千计争取自由的斗争，他是现代思想之父。”这二人的“自白”很有意义。在他俩看来，马克思之所以是第二千纪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第一号”，并不仅在于他的思想在他活动的年代有巨大影响，更在于他是现代思想之父，对认识当代世界仍极具参考价值，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至今仍未过时。

这次国际互联网自由评选的结果是意味深长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评选活动的主持者，并不是我们中国或其他共产党国家，而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媒体之一英国广播公司（BBC）。如此的结果和结论，显然是那些自认为赢得了“冷战”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始料未及的。他们也许不会承认，也许至今仍高声反对；但 BBC 评选结果所表现的，是一千年中的历史事实，而这次评选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事件，而历史事实是抹不掉的客观存在。这个事件值得一切有思想者深思。尽管曾经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输掉了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冷战”，但“马克思主义”却并未在与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思想斗争中输掉自己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与伟大价值。因为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并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甚

至在很大程度上不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真义。在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时候，不能忘却上述这个历史的启示。

在我们身处现当代的世界大环境中，通过 BBC 1999 年的评选活动分析和认识马克思作为第二千纪“最伟大”、“最具影响力”人物的意义和价值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忘记或抹煞历史事实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自从诞生以来，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思想上，都成了激烈争议的对象。国际社会的各色人等、各个阶层、各种学术思潮和政党派都曾卷进这场思想争辩和政治斗争之中。这种论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现在仍在进行，未来大概也不会停止。BBC 的评选结论，也不会平息世界上各种各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声浪。这就像西方式民主国家的总统选举一样，多数票选出的总统获得了合法的执政权，但反对派即使处于少数，仍可继续坚持他们的反对立场，进行其反对活动。对于这种客观的历史和现实，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还是对作为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的宗教理论，我们都应该保持一种科学的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直提倡我们要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抱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全面、准确的了解。近年来，中央有关领导更具体地要求我们在研究他们的论述时，要分清“四个哪些”问题：

1. 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 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
3. 哪些是必须破除的教条式的理解；
4. 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

这“四个哪些”，深刻地体现了邓小平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我认为，在马、恩创建马克思主义 150 余年之后的今天，用“四个哪些”的精神和原则去分析它所包含的各种内容（特别是本书所要研究的宗教观）是十分必要的。这 150 余年的历史，无论是在全世界，还是在我们中国，都是社会激烈变化、各种社会文化思潮风起云涌、互相竞争而又彼此渗透的过程，这就决定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包括它的宗教观）的发展必然是曲折多变的。其中，既有自身的演变，也有鱼龙混杂的情况。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一家所独有的特例。在人类历史上，各种

曾被认为在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重大影响的思想文化体系，它们的发展进程都不会像复印机或生物基因一样，一代接一代地自我复制。它们一般都会随时代的演进、社会的变迁而发生适应性的演变。它们的反对者会提出针锋相对的反对意见；它们的追随者也会对其宗师作出不同的理解；除此以外，它们会不时遭遇别有用心的曲解以及有意无意的误读。时过境迁，原版思想体系就会不同程度地改变其本来的面目，被附加上许多原版没有或与原版不同的东西。有符合于原版之“正义”者，亦有违背原版基本精神之“邪门歪道”。试以佛教为例。佛陀逝世后，佛陀弟子的第一次结集就在教内产生了以大迦叶为代表的一派与以富楼那为代表的另一派的争论，两派各将所闻佛陀教诲定为“佛说”。第二次结集发生了戒律之争，正式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以后的论争更扩大到对一系列佛教基本教义的理解（如宇宙是实有还是假有，有我还是无我，有神还是无神），佛教分裂为几大部派。贵霜王朝时，则正式分为大乘和小乘两大教派。佛教世界化过程中，更与当地的传统宗教相结合，使佛教具有了地区性色彩，如以禅宗为代表的汉地佛教、以活佛信仰为特色的藏传佛教，等等。佛教如此，基督教、伊斯兰教更是如此。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与上述诸大宗教的情况也大致不差。孔子之后，诸子学说先后兴起与之争鸣。孟子时竟出现了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则归于墨”^① 的情况。儒家学派内部分化的情况也很严重。按韩非子的说法：“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② 荀子儒学自立门户，除抨击思孟之儒外，还指斥子张、子夏、子游诸儒学门派为“贱儒”。两汉时代及其之后，儒学上升为独享尊荣地位的国家哲学，但儒学内部仍不断因意见分歧而出现对立的学派。汉朝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宋明则有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分化；明清时代，则兴起了否定程朱陆王的“实学”和以戴震、颜元为代表的新派儒学。五四时代，孔孟儒学作为封建时代礼教的思想基础，被启蒙学者批得一无是处。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

① （宋）华镇撰：《云溪居士集》卷十六，《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② 《韩非子》卷十九，《四库全书·子部·法家类》。

孔”、“评法批儒”运动更把它再度打翻在地，踏上千万只脚。可现代新儒家们却逆风而上，把儒学重新拾了出来，并用新时代的话语（从西方的康德哲学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孔孟之道作了新的诠释。古代的儒门圣哲穿上了时代的新装，面目一新矣！

这些思想文化史上的历史事实，应该能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以及其他各个方面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当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宗教理论当成一个学术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时候，绝不能把它当成一成不变的东西，既要紧紧地把握它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的时代特性，也要努力跟踪它们在历史发展链条中的连续性；既要看到它们的那些作为马克思主义之基础的基本原理，也要看到它们随时代和具体事物的改变而必须改变以至毅然放弃那些确已过时的论断。对于某些敌对者的有意歪曲和诬蔑，我们当然应该据理辩正，但对于信从者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诠释，我们则需要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对误解者，纠其误而正其解无疑是必要的；但对那些有别于传统“正说”，但却适应了新社会的需要，符合新时代精神的“新解”或“新说”，我们则应肯定其为与时俱进的创新，以此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与时代精神的结合，使其能随着社会的前进而不断发展。固执陈见，率由旧章，把昔日经典的一言一语，视之为神圣的天启，句句是真理，一个字也不能改动，是不可能有思想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社会也就因此而被旧传统所固结，不会有什么进步了。今日之地球上，充满着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物种，它们的存在和发展，构成了我们这个五彩缤纷、万紫千红的大千世界。然而，它们都是从几十亿年前诞生于世的原始生命体长期演进而来。如果原始生命体不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它们的基因不随时随机而发生变异，我们这个地球还会有今日之繁华荣茂、多彩多姿的盛景么！适者生存，生则变易，“变则通、通则久”，这是生物发展的规律，也是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不能例外，作为其组成部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也不能例外。只有根据这种观念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及其宗教理论，才是科学的态度。这也正是“四个哪些”原则对我们的要求。笔者曾在1984年（那正是邓小平倡导的“拨乱反正”的年代）写作《宗教学通论》一书时谈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应持的态度，写下了这段文字：

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宗教理论，它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经受了历史实践的检验，至今仍是正确的，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宗教观可以为我们的宗教研究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但是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点或那个理论当成现存的结论或永恒不变的教条，更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个别论断当成证明的工具。彻底的辩证法不承认超时空的绝对物，当然也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自身绝对化。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一种开放的系统，既要敢于随时抛弃已被实践证明为错误的东西，更要不断研究新的问题，吸取新的营养，使自身得到发展。^①

写过这段话后，时间已过二十余年之后，但我到今仍坚持这段话的基本内容。我认为，它和中央现在提倡的“四个哪些”原则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写作本书时，我们将努力应用这段话所体现的“四个哪些”原则的精神。

问题在于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时，究竟如何具体体现“四个哪些”原则？或者说，如何在研究中，一方面坚持展现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中那些“正确的”、“有生命力的”科学内容。另一方面，又不把它绝对化、神圣化为宗教式的信条，“既要敢于随时抛弃已被实践证明为错误的东西，更要不断研究新的问题，吸取新的营养，使自身得到发展”？要在研究实践中具体贯彻和展现这些原则和精神，根本之点是要在研究过程中应用确有科学意义的方法论。在我看来，这种具有科学意义的方法论，就是马、恩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对一切社会历史现象进行理性分析基础上的哲学世界观。它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分化与阶级分析的原理，如果能得到研究者准确的理解和科学的应用，那它们对一切社会历史现象和社会文化形态的认识与分析都具有普遍性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理论本身，本质上就是马、恩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① 吕大吉主编并主笔：《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